

# 五四一代人的“爱国”， 你我真懂吗？

JIMMY / 文 2019 / 5 / 3

五四一百週年 × 當下思考與運動  
專輯



思想與運動的交匯處

WWW.REIGNITEPRESS.COM



## 五四一百週年 ×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

2019/5/3

〈五四一代人的“爱国”，你我真懂吗？〉  
〈到底谁是“新”儒家？——论五四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〉  
〈五四青年給今日“不激進青年”的一個大抱抱〉

2019/5/4

〈五四青年的工学实践〉  
〈五四一百年，民主路何其遥远？〉



更多專輯文章請見 [WWW.REIGNITEPRESS.COM](http://WWW.REIGNITEPRESS.COM)

编案：

“怀火”是一个致力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台。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，“怀火”的青年作者在重新阅读五四历史、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，立足于当下的思考与社会运动，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大陆政治、社会、文化与精神现状。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方宣讲、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“拯救”出来，让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面向获得对当下的启发。

“五四一百周年×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”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推出：

#爱国主义：从五四时期“爱国主义”作为回应被问题化的西方现代性的产物，探讨彼时“爱国主义”的丰富意涵及其当下的扭曲；

#新儒家：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、中西文化、民主与政治的论述基础上，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兴；

#青年：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角色的脉络出

发，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“背面”为资源，寻找今日“不激进青年”政治化的契机；

#民主：从五四至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，讨论今天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；

#工学联盟：学生在面对工人时，逐步透过实践与理论的辩证，与工人相结合

在“五毛”与“美分”之间，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：不是大清国的天朝幻象，就是以西方为师的单向度视野。我们要像五四一代那样大声喊出：“两个都更糟！”二元对立的选项永远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，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。非此即彼，是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，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：第三世界、国际主义的视野，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文明构想。

## 一、引言：重返五四现场

让我们穿过历史教科书的陈词滥调，重访一百年前那段燃情岁月。那是 1918 年 11 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中国所属的协约国集团获胜了！胜利的电报传到国内，政府宣布放假三天，你是游行庆祝的公民，相信中国将从此站起来了。你是新上任的北大校长蔡元培，在天安门对人群演讲道：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意味着西方民主（英、法、美）战胜了专制（德、奥匈），意味着人类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。

1919 年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，中国最优秀、最现代化的精英们将代表这个国家前去谈判。你是外交团的领导陆征祥，受西式教育长大，在欧洲许多国家做过外交官，还娶了一个比利时老婆，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说的“民族自决”可以帮你在外交场上赢回中国被剥夺的土地。你是顾维钧，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校友，

曾经的大学辩论队成员；你在1月27日下午的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回应日本，不时引用国际法、拉丁语的一席雄辩惊艳了会上各国的代表。

然而，时势急转直下：日本威胁退出国联，除非山东归他们；美国为了日本，最终放弃了中国。1919年5月，外交失败的电报传到国内，你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，得知消息的瞬间震惊无比；你彻夜难眠，通宵和朋友们在一起，痛斥政府的无能、列强的无耻。两天以后，你跟随大家走上天安门广场，并不知道这一天将会被永久铭刻进民族的记忆。6月，你是上海的纱厂工人，为支持被捕的北京学生，你同成千上万的工人们一道罢工。你是全国各个省份的普通男女，你从报纸上、布告栏上读到了刚发生的事，或是听那些识字的人说起。你恍惚了片刻，一个新的未来似乎正在你眼前展开。

你是一百年前那段日子里，一个个有名或无名的

旁观者、失望者、参与者、幻灭者、行动者。你就是中国，被侮辱的、被损害的中国，必须涅槃重生的中国。

## 二、五四中国：反现代的现代性

### 1. 开启现代中国

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。近几十年来，学术精英们不再愿意谈论五四的“爱国”面向，隐隐认为爱国并非什么高级情感：夏志清将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直斥为“感时忧国”——英文原文“obsession with China”，直译为“对中国的过度迷恋”；而李泽厚则以“救亡压倒启蒙”的著名论断，将启蒙事业的未竟归罪于“救亡”——一个替换“爱国”的中立修辞。

随着“爱国”维度的直线贬值，五四的开创性意义



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。比如，一种极为流行的现代化史观，将五四作为“思想文化的现代化”，放置在“器物的现代化”（洋务运动）、“制度的现代化”（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）这一序列之末尾，仿佛五四只是中国现代化路途的另一处驿站。此种现代化史观是如此地主导了当下的话语，已经成为目前高考历史学科简答题的必备考点（高中读文科的朋友想必深有体会）。

这种说法着眼于五四对晚清以降现代化进程的延续，也不无道理。但是，五四确实造成了某种历史的断裂，这深刻的断裂使此后的中国历史再不能恍若无事般延续过往的轨迹。这断裂就在于：五四之所以是“现代中国”的真正起点，关键不在于“现代”，而在于“中国”——是五四，让“中国”成为了我们重新思考“现代”的坐标。于是，五四以来的“现代中国”就表现出汪晖所说的一种“反现代的现代性”、对现代性本身怀有疑虑的现代性。而这一特点，确乎与五四“爱国”的基

本命题有关。

## 2. 现代性的塌落

何谓“反现代的现代性”？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个历史时刻：一战胜利后的中国，浸染着乐观乃至狂欢的情绪；这乐观根本上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信心，是对人类文明在西方带领下“向着光明去”（蔡元培演讲用语）的信心。中国在一战中为协约国贡献不少，尤其在人力方面（十五万中国劳工被送往法国），因此相信自己会被西方给予一个平等的机会，特别是威尔逊提出了“十四点和平原则”。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也并非失败，相反地，外交官们大多是中国在几十年教育现代化后培养出的一代西式精英；西方外交官有的素养，他们也有。对于许多国人而言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中国可能从此在“世界（西方）民族之林”中享有一席



之地。

况且，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按照西方框架建立的共和国，还效仿美国采取了最先进的三权分立体制；纵然共和国有名无实，权斗不断，在外交的意义上毕竟不同于以往，因为中国不再代表一个前现代帝国。此前近代史上的历次外交屈辱，人们尽可以归罪于愚昧落后的清政府，或是在大汉中心主义、“非我族类”的传统偏见下归罪于满族。通过种种归罪、转移视线，忙于向西方学习器物、制度、思想的晚清时人无法直面这个问题：“很奇怪，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？”

（毛泽东语）。现在是民国了，大家想：我们可算学成出山了，先生不会再打我们耳光了吧！

可以说，此前的中国现代化遵从着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逻辑：为了不挨打，必须按照西方标准改变自己。更不必提保守派的天朝大国心态，在与西方不断的、偏执狂式的对比中，维持着“嗯，还是我最强”的幻象。

总之，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，晚清的中国必须通过西方——强者之镜——来观照自我。中国给自己设定了任务，要由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奋力向中心处——强者的位置——攀爬。在五四一代的眼中，这个强者的位置，那曾经不证自明的中心处，现在却突然显得可疑。

其实，对西方现代性的疑虑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一战所显现的欧洲危机，从其爆发的 1914 年开始便刺激着中国知识界的讨论：欧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场战争是民主 vs. 专制吗，抑或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部竞争所致？而中华民国自建立以来的共和危机——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等等乱象——也活生生展示着代议制民主是如何沦为政党政治权斗工具的。人们慢慢意识到，这是中国的问题，却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：代议制民主与绝大多数的国民有什么关系，这个体制真的能代表国民的声音吗？

1919 前，更为赤裸裸地向中国人展示了现代性之暴力的，是日本。同样是被殖民主义敲开国门的国家，日本成功地现代化，实现了“脱亚入欧”；所以自 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，日本就被视为中国“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”的楷模。彼时，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在中国也颇有市场：全亚洲联合为新的强者，从而对抗欧洲的形象，怎能不激动人心？直到 1905 年的日俄战争，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，国人才如梦方醒：原来大东亚主义只是换了一张脸的帝国主义，而日本的现代性也只是换了一张皮的西方现代性。当年，正是日俄战争中日军处决中国人的影片、身旁日本同学的喝彩和影片里中国人的麻木神情，让鲁迅从日本医学校的教室走出来，走向了另外的道路。再经由 1915 年《二十一条》的风波，到五四之时，对日本和西方的深刻幻灭汇成一股巨流。这巨流将扭转历史的逻辑，造就历史的断裂。

### 3. 被损害者的洞察

强权崇拜的逻辑——边缘变中心、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逻辑——现在塌落了。中心、强者、不言自明的梦想，现在垮台了。于是，五四一代说：我们要新的逻辑，我们要新的文明。新的逻辑将是不同于天朝中心主义、西方中心主义，或东亚中心主义的逻辑。新的文明将是不同于传统中国，亦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。

五四一代各自的主张千差万别，但分享着相同的前提、相似的觉悟。“世界”是他们的关键词：“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，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”

（李大钊）；“世界人之世界主义”（杜亚泉）；“此后的世界，全是劳工的世界”（蔡元培）。这个“世界”，不再是伪装成“世界”的西方；五四一代开始在一个国际主

义、全球人民的视野中，摸索着创造一个新的中国。这一视野的获得，来自血与火的残酷，来自被侮辱、被损害者的洞察。

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“短二十世纪”之说，他将二十世纪的起点划在了 1914 年，一战开始的日子。之所以如此划分，是因为他将“二十世纪”视为与“十九世纪”相断裂的时段。十九世纪，现代资本主义在欧美发展成熟、所向披靡；而二十世纪的两大基本主题——战争与革命——让世界告别了十九世纪模式。这一“告别十九世纪”的觉悟，被时任《东方杂志》主编杜亚泉表述为十九世纪的“旧文明”将被“新文明”终结的必然：“今大战终结，实为旧文明死灭，新文明产生之时期。”所谓“旧文明”，就是现代文明：“旧文明者，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，而新文明者，即以公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。”以此而论，五四开启了现代中国，也与全球发生的种种事件共同开启了二十

世纪的世界。

### 三、创造新文明：既是现代的，又是中国的

#### 1. 直面中国传统

如何在中国创造一个新文明，当一向的引领者—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破产？正如张旭东指出的，五四成功地把晚清以来讨论不断的“中西”问题转换成了“古今”问题；即是说，把“向西方学习”的单向命题，转换成了面对传统与历史的复杂命题。

于是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首先是一种“现代”精神：自我批判的清醒、直面民族丑陋的勇气。五四从不是那种右翼民粹主义政治——虚构一个神圣化、本质化的民族主体，以重返“过去失落的好日子”为己任。五四一代把理想中国的乌托邦寄予未来，于是便对自己的过去施以最严厉的省察。

同时，五四的爱国是一种重新创造“中国”的气概：发掘中国文化资源的努力、更新民族精神的创造力。常有一种关于五四的迷思，认为五四“全盘西化”、摧毁传统，此种说法忽略了一件事：每一次解构都是一次建构。事实上，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只是极个别，而大部分五四人认为民族主体既然并非本质化的，便有流动、更新、改变的无穷可能。

五四时期及其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各个流派：激进的左翼（如鲁迅）、谨慎的自由主义者（如胡适）、新儒家（如梁漱溟）等等。他们千差万别，但都致力于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明：既是现代的，又是中国的。

比如新儒家，顾名思义，是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资源，以补充现代性的弊病：冰冷的工具理性、社会的原子化、竞争至上的原则……新儒家往往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，甚或应被开除出“五四”队伍。但我们不应忘记，梁漱溟、杜亚泉们大多曾在早年醉心于西方



文化、制度、自然科学，直到一战期间才产生思想的转折；转向新儒家的同时，他们也大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（即使对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有所保留）。他们实实在在地分享着五四一代的问题意识。

对儒学道统怀有更多疑虑的思想者，则试图在儒家之外挖掘民族文化的闪光点。胡适主张的“整理国故”就将范围扩展了许多。胡适的名言：“‘国故’包含‘国粹’；但他又包含‘国渣’。我们若不了解‘国渣’，如何懂得‘国粹’？”其实，“国故”这一命名本身就饶有意味：“故”字暗示整理者自己是新时代的新人，而非什么大清国的遗老遗少。

作为左翼的鲁迅曾对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嗤之以鼻，也有“把线装书扔到茅坑”的著名宣言。然而，如众多研究者所言，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远为复杂，比如他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整理花了不少功夫；余英时也曾论证鲁迅多么酷爱魏晋思想。此外，鲁迅的最后一本

短篇小说集《故事新编》中，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式的现实批判消隐了，整本书是重写的上古历史传说：女娲、大禹、墨子、眉间尺，都被书写成鲁迅式的、可笑可悲可敬的中国英雄。鲁迅的激进内核也正在于此：他回到两千年前的历史，探寻民族文化尚未被扭曲、污染的源头所在。

## 2. 乡土中国的浮现

在五四一代对过往历史的整理与重读中，日渐凸显的中国关键词是“乡土”与“农村”。现代资本主义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文明，而古代中国则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文明。从鲁迅的《故乡》（1921）到周作人的散文如《乌篷船》（1926），我们看到绍兴农村的形象在周氏兄弟的笔下悄然改变了：农村不再仅仅是愚昧落后所在，也拥有现代性无法提供的美好。如果说

周作人的“新村主义”还太过文化精英、太多古代士大夫的气味，那么中国新兴的社会科学将会延续对乡土的关注，在十余年后诞生《乡土中国》（1947）这样的重量级著作。

五四一代对乡土中国的重视，并未停留在文化、学术的层面上。农村的“现代化”或“反现代的现代化”任务，驱使着五四一代投身于实地调查以及乡村改造。梁漱溟试图重建农村伦理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是其中一例；而毛泽东以农民动员为标志的土地革命路线，则与梁漱溟理念构成了参差的对照。梁与毛的巨大差异不可忽视，但如沟口雄三所说：“他们两人在把农村的变革当成革命的主线这一点上是大致相同的”。梁漱溟开始“乡建”探索的1927年，恰恰也是毛泽东发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年份；三十年代，两人在延安亦有过密切的交流与辩论。因此，沟口雄三把梁漱溟传统称作“另一个五四”便不足为奇了，这一传统与

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代表的“五四正统”形成了微妙的复沓。

总之，五四并非社会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等等现代西方思想来中国划分地盘的过程。五四一代批判并拯救中国传统；他们也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系下，批判并拯救西方理论。

#### 四、超越“五毛”和“美分”——五四爱国精神之今读

##### 1. “五毛”与“美分”的虚假对立

今天，当“爱国”二字一出，人们即刻联想到网络“五毛党”：狭隘、自大、沙文主义的“爱国”群体。与之对垒的，则是“美分”：欧美崇拜的自由主义群体，时而伪装成世界公民、普世价值持有者。面对大大小小的社会议题（近两年如《战狼》、《流浪地球》、巴黎圣母院 vs. 圆明园……），“五毛”和“美分”的斗争持续撕裂

着网络公共空间。无论这两个群体被赋予何种新名称（“小粉红”、“自干五”等等），“五毛”与“美分”的二元对立已然构成了主导性的思维模式：面对特定的社会事件，我们不是站“五毛”——把中国说得完美无瑕，就是站“美分”——把欧美说得完美无瑕。

稍加细察便可发现，两种叙述都建立在一系列的谎言和神话之上。“美分”的谎言是对欧美帝国主义历史的抹除，对当今世界仍活跃的新殖民、侵略行为视而不见，对全球化中的种种暴力不置一词。同时，“美分”也往往患有重度民族失忆症：绝口不提中国遭欧美侵略的血泪历史，或将其描绘为美好的“现代化进程”的必要代价。对他们而言，五四一代因一战、巴黎和会而获取的历史洞察似乎从未发生过。

而“五毛”的致命缺陷，我们以五四的爱国精神为镜，更可照得一清二楚。今天，每当国人有质疑的声音、反抗的行动，无论是来自工人、学生、白领阶层、

性别或族裔方面的少数群体，必立刻遭受排山倒海的质疑：你不爱国么？你是被“境外势力”渗透吧？“五毛”对“境外势力”的恐惧早已脱离合理怀疑范畴，发展为无可救药的偏执狂。他们对民族自我批判的极低耐受力、对稳定现状的极力维护，不禁让我们感叹五四一代“越批判越爱国”、“越改变越爱国”的奇迹。或许姜文的一个说法比“五毛”这个名字更合适此群体：他们不是卖国贼，却是“爱国贼”。

网络民族主义的一支——“工业党”，更加与五四爱国精神背道而驰。“工业党”崇拜技术、工业、发展等等现代迷思，而五四一代所关心的乡村、农民等中国议题，他们统统不屑一顾。“工业党”的民族主义理想是让中国成为高仿欧美现代性的复制品，一幅强大到超越了欧美“原画”的赝品。不必奇怪，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以目前世界的强权——西方——作为自己的范本与镜像。荒诞的是，“工业党”崇拜现代迷思的同时，

女性主义、环保主义等思潮又被他们拒于门外，理由是“来自西方，不适用于中国”。

在“五毛”与“美分”之间，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：不是大清国的天朝幻象，就是以西方为师的单向度视野。我们要像五四一代那样大声喊出：“两个都更糟！”二元对立的选项永远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，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。非此即彼，是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，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：第三世界、国际主义的视野，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文明构想。

## 2. 另一种爱国主义

我们知道，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基础。那么，是今日世界怎样的政治经济基础，造就了五毛 / 美分的意识形态？



从 1919 到 2019 年，一百年过去了。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天翻地覆，摆脱了受人欺侮的命运，成为了世界的资本中心之一。并且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等跨国计划的施行，中国也许正在成为区域性的霸权力量。但百年后的世界呢，是否也变得截然不同了？冷战结束、“历史终结”近三十年，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却日益倒退回一战前的状态：原始、不公、弱肉强食、贫富分化越发严重，这正是皮凯蒂（Thomas Piketty）《21 世纪资本论》向我们揭示的今日经济现实。作为全球化的回应，是近年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，在世界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。民粹主义用种种排外主义、种族主义捕获了大众的焦虑情绪；用形形色色的神话转移了人们的视线；用狭隘的身份认同，搁置了人类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思考、质询和批判。

二十一世纪向十九世纪的倒退，已是我们时代的集体潜意识——事实上，许多人已经将今日局势，类

比于一战前的世界。由此看来，二十世纪的命题还远远没有结束，“短二十世纪”的挣扎将继续延伸、继续引领我们。只要这个世界一天不能告别十九世纪，五四对我们而言就依然是重要的。今天，重提五四的爱国精神，就是要铭记五四一代人的历史选择，重新激活他们曾分享的爱国信念：隐含了国际主义视野的爱国主义、被损害者的爱国主义、去中心的爱国主义、反“爱国贼”的爱国主义。五四一百年，是时候了：夺回先辈“爱国”的旗帜，共同想象别样的可能。

## 参考文献

Margaret MacMillan. 2003. *Paris 1919: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*. New York: Random House.

沟口雄三 (1997) 《另一个“五四”：评梁漱溟的思想》，载《中国文化》1997年第15、16期合刊。

霍布斯鲍姆 (Eric Hobsbawm) (1994/2014) \* 《极端的

年代：1914-1991》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。

李泽厚（1986）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》，载《走向未来》创刊号。

皮凯蒂(Thomas Piketty)（2013/2014）\*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。

齐泽克(Slavoj Zizek)（2019）《它们都更糟！》（王立秋译），见“乌有之乡”，

<http://www.wywxwk.com/Article/guoji/2019/02/399724.html>

汪晖（1994/1997）\*《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》，载《天涯》1997年第5期。

——（2009）《文化与政治的变奏：一战和中国的“思想战”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3期。

夏志清（1961/2005）\*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
余英时（1979）《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》，收入《五四研

究论文集》，台北：联经。

张旭东（2009）《“五四”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》，载《现代中文学刊》2009年第3期。

\*括号中，前一个年份是文献初次发表的时间，后一个年份是再版或中文翻译版发表的时间